

LEADERSHIP

领袖

插图版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James MacGregor Burns) 著
常健 孙海云 等 译
常健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EADERSHIP

领袖

插图版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James MacGregor Burns) 著
常健 孙海云 等 译
常健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领袖：插图版/(美) 伯恩斯特著；常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
(人文社科悦读坊)

ISBN 978-7-300-18307-7

I. ①领… II. ①伯…②常… III. ①领导学 IV. ①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7708 号

人文社科悦读坊

领袖 (插图版)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James MacGregor Burns) 著

常健 孙海云 等 译

常健 校

Lingx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5.7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67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是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是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

——马基雅维利

总统之位……是道德领导的卓越之地。我们所有伟大的总统，都是当国家生活中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观念需要澄清时，作为思想的领导者挺身而出……总统的职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我们重新应用或在新的条件下应用人类行为的那些我们一贯依赖的简单准则。如果没有机警的对变化敏感的领导，我们都会陷入泥淖或者迷失道路。

——富兰克林·D·罗斯福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

这就是领导艺术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

译者序

伯恩斯：人物生平与变革型领导理论

一、人物生平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James MacGregor Burns) 于 1918 年 8 月 3 日出生于美国波士顿市郊的梅尔洛斯 (Melrose)。他排行老二，曾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但只有他长大成人。他在自由主义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的家人们在餐桌上谈的是如何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且据说他的曾祖父曾留宿路过他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并在道格拉斯临行前借给这位由奴隶转变为反奴领导人的传奇人物三美元。

在选择上哪所大学时，伯恩斯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而进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这是因为该大学所在的环境吸引了他。1938 年毕业后，他来到华盛顿，在犹他州民主党人阿贝·莫多克 (Abe Murdock) 的办公室做青年实习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于 1943—1946 年到军队服役，在太平洋战区担任战争史学家，并因在塞班岛、关岛和冲绳岛战役中的贡献而被授予青铜星章和四枚战争星章。

二战后，伯恩斯进入哈佛大学，在那里获得了他的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 年，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在那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考问国会》(Congress on Trial: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这本书赢得了《纽约时报》书评的赞扬，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此后，他接受了威廉姆斯学院政治学的教职，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退休。

伯恩斯希望将他的理论与政治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但前提是要在道德上站得住脚。他曾经是四届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于 1958 年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他在马萨诸塞州第一国会选区获得民主党提名，但竞选以失败告终。当年约翰·肯尼迪准备竞选总统时，曾邀请他加盟竞选班子，但遭到了他的拒绝。这是因为，尽管他对肯尼迪个人非常欣赏，但“却对其是否具备总统这一职位所要求的全部品质没有把握”^①。

^① James Burns, *John Kennedy: A Political Profi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0.

直到两年后，他才决定支持肯尼迪的竞选，并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积极为肯尼迪寻求支持。他还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但后来却猛烈抨击克林顿、戈尔的中间主义路线。

根据美国专栏作家皮尔·特里斯坦姆（Pierre Tristam）1999年4月对伯恩斯所作的采访，伯恩斯结过两次婚，有四个孩子。他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他与前妻琼共同照管他们的金毛猎犬杰斐逊——它的名字是以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来命名的。白天，这条狗待在伯恩斯的房子里。到了傍晚，伯恩斯会向它仪式般地唱一首歌，接着便会打开后院的玻璃门，看着它跑下山坡，奔向琼的住所。他每天写作两三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并用同样多的时间阅读。只有在他不写作时，他才会感到无聊和不适。他并不看电视，但阅读《纽约时报》，并从来访者那里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

评论家们经常称赞伯恩斯那气势如虹的文风，赞赏他那种将支离破碎的历史事实和种种散乱的分析构造成天衣无缝的宏大叙事的能力。但他在写作时也不时会遇到写不下去的时候。这时，他就会这样鼓励自己：“詹姆斯，你是如此幸运能够从事写作，能够有出版合同。而其他人在做那些艰苦的令人生厌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有它的低潮。现在这只不过是你的低潮期。”伯恩斯所写的书并非都很畅销，三卷本的《美国的实验》已不再印刷。有些人认为在当今这个渐进主义和专业化盛行的时代，他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和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似乎并不合时宜。但伯恩斯并不悲观，他认为挫折和暂时的后退是实验尝试的应有之义。他一直还在积极从事领导学的研究和写作。

2014年7月15日，96岁高龄的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与世长辞，留下了20多部著作。

二、高产的总统传记作家：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

1971年，伯恩斯因其著作《罗斯福：自由战士》一书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两项桂冠。这是伯恩斯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写的第二部传记，此前他还写了《罗斯福：狮子与狐狸》一书。伯恩斯是一位高产的总统研究专家和总统传记作家，他的总统传记或总统研究性著作还包括《三个罗斯福：转变了美国的贵族领导者》、《约翰·肯尼迪：一位政治人物》、《爱德华·肯尼迪与盛世传统》、《医治与构筑：林登·约翰逊的计划》、《僵死的中间：克林顿、戈尔的领导方式与温和中庸的危险》、《乔治·华盛顿》等。

在1956年所写的《罗斯福：狮子和狐狸》一书中，伯恩斯指出，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够娴熟地在交易型领导风格与变革型领导风格之间变换。交易型领导者是经纪人，是“狐狸”，在各种竞争的利益之间进行交换，使组织或国家的“战舰”保持平稳。而变革型领导者则是“狮子”，他能够促成广泛和深刻的变革，使新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替代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罗斯福的新政和他在二战中的表现，就体现了变革型领导者的特征。

伯恩斯于1999年出版的《僵死的中间：克林顿、戈尔的领导方式与温和中庸的危

险》一书，则备受争议且影响广泛。在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时，伯恩斯曾对他寄予厚望。但随着克林顿医疗改革政策的失败，伯恩斯对克林顿的领导方式产生了怀疑。在这本书中，伯恩斯与索伦森强烈批评克林顿和戈尔的温和主义的中间路线战略，指出它与过去50年美国总统一所奉行的战略大相径庭。它开创了一种优柔寡断的领导作风，无法使真正的领导得以实现，并将对美国政治产生负面的影响。伯恩斯强调，最好的领导者是变革型的，他们无惧于公众舆论和政治上的阻力。在美国总统中，伯恩斯最欣赏的变革型领导者是西奥多·罗斯福，其次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次则是罗纳多·里根，这并不是因为他同意里根的政治主张，而是欣赏里根的领导方式。

在2001年出版的《三个罗斯福：转变了美国的贵族领导者》一书中，伯恩斯和苏珊·丹回顾了三位罗斯福如何通过他们的领导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图景。从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交易，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和战时领导，再到埃莉诺·罗斯福在联合国初创时期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该书通过对这三位领导者的生平的分析，展现出他们如何从纽约封闭的精英圈子中脱颖而出，对抗经济特权阶层，从而成为美国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政治家族。

在2003年出版的《变革型领导：对幸福的新追求》一书中，伯恩斯探讨了领导者如何从“交易者”（deal makers）转变为重大社会变革的代言人。他强调，领导者必须倾听他们的追随者，因为这些追随者也具有做出重大贡献的潜能。领导者是通过充分回应追随者的需求和愿望而取得领导地位的。对创造性领导的最终检验不仅在于新观念的创造，而且在于使这些新观念在现实中获得生命。他指出，21世纪对领导的最大挑战，就是用领导的方式来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该书中，他用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的尺度来衡量许多现代领导者。被划入变革型领导者之列的有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子爵和埃德蒙德·伯克、19世纪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伊利奥特、倡议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法国外交家雷赛布、英国首相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捷克总统哈维尔等，毛泽东也被列入变革型领导者之列，虽然伯恩斯认为他缺乏交易型领导的技巧。被列入交易型领导者之列的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拿破仑、克林顿等，伯恩斯无法完全确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当归属哪类。

三、变革型领导理论

除了对总统进行研究并撰写总统传记以外，伯恩斯还从政治领导的角度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并出版了十多部著作。在对多位美国总统和美国政治领导体制研究的基础上，伯恩斯将领导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世界各国，并提出了关于领导的独树一帜的理论。这集中体现在他于19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领袖》一书中。这一直是他最偏爱的一部著作，被学界推为领导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后，伯恩斯又出版了多部著作，进一步发展其领导学理论。

伯恩斯领导学理论的核心，是变革型领导的理念。该理论有三个主要支点。

第一，他将领导定义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伯恩斯的观点，传统的领导概念，其主导形象是总统或首相居高临下向大众宣讲。然而，真正的领导实际上并不在于权力和统治，而是一种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定义，领导就是引导追随者依照领导者和追随者共有的价值和动机去行动。这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最高境界是领导者努力提升追随者的意识，其最低限度则是使领导者与追随者致力于一项共同的事业。

第二，他区分了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所谓“交易型领导”，就是“为了交换有价值的东西而主动联系他人”。与此相对，所谓“变革型领导”，则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以互相提升动机和道德水平的方式而彼此结合”。虽然变革型领导者的最初动力是追求个人得到承认，但最终由于其与追随者的渴望结合在一起而促进了集体目的的实现。在他看来，毛泽东和甘地深得变革型领导之精髓，他们迎合了人民的最初需要，但同时又高度关注人民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和渴望。

第三，他强调变革型领导是一种道德领导。为此，伯恩斯特别区分了“领导者”与“掌权者”：领导者是以某种方式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掌权者则只是要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管这种目的是否是其实施权力的对象所共有的。根据这种定义，希特勒就不能算是领导者，而只是一个掌权者。

在伯恩斯看来，领导并不限于政治领域，它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之中，从伟大的领袖到母亲和教师，从同伴到顶头上司。但在每一种情况下，领导的关键都是去发现共同的目标以及在动机和价值方面的相互作用。借助于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伯恩斯提出，领导就是将人们从较低的需求和道德发展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真正的领导者是那种追求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他们的动机是成长、成效和成就，即自我实现，而不是出名。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会认真关注他人的需求，并向他人学习，因而具有“被领导者领导的能力”，从而能够通过帮助追随者意识到他们真正的需求而领导他们去达到他们的自我实现。

伯恩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在领导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调查显示，截至2003年，在领导学研究领域中，有600多篇博士论文以它作为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被高度概括在我们现在看到的《领袖》这部经典名著之中。

伯恩斯在领导学界有很高的声望。生前他曾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主席、马萨诸塞州波克夏县反歧视委员会主席，并且是享有盛名的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时代需要变革型的领导，特别需要具备交易型领导技巧的变革型领导。对那些希望在中国的变革大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者来说，伯恩斯在本书中详细阐述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和各种实例分析，无疑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常健

于美国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

中文版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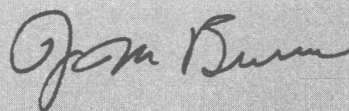
欣闻中国读者——其中一些是我在一些年前访问中国时结识的——希望我为这个新的译本作序。对领导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探求领域，我很高兴地得知，在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大学中，领导学的研究正日益广泛。

与诸如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及其他一些源远流长的学科相比，对领导的系统的和分析性的研究，在西方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我在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研究的都是政治学。我后来也教授政治学，但日益转向领导的理论和实践。（我在1958年与约翰·肯尼迪一同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结果他赢了，我输了！）

我为什么从政治学转向领导学？部分原因是政治学倾向于强调制度和过程，而我却越来越对研究政治哲学和道德问题感兴趣。我逐渐相信，对领导者的检验，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而不是看其如何进行政治交换、居间代理、“巧取豪夺”这样的“交易”事项。简言之，理念是构成领导的关键因素。对我来说，这种超越性的理念来自于所谓的启蒙运动——中国读者将会采用自己的哲学标准，它既可以来自西方的伟大理念，也可能出自东方的智慧学说。

我观察到，在有着强大道德基础的变革型领导与单纯的行使权力或统治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生活在东方和西方的人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强势领导者，他们的唯一目标，似乎就是集聚更大的权力，却很少关心他们的“权力实施对象”。我认为，赤裸裸的权力行使是与道德或伦理领导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对领导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领导者招募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又会反过来变成原先领导者的领导者。这必然会提出道德问题——用什么标准和尺度来检验和衡量这种动员过程。这种检验标准拒斥“盲目追随”——这又产生了更广泛、更复杂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领导研究的核心。

我被要求就中国读者应当如何阅读这本书提出建议。我的建议是批判性地阅读——这样，一些读者就可能会写出他们自己关于领导的与时俱进的著作，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新的研究能够利用过去二三十年来东方和西方领导学研究方法已经取得的成果。



序言

领导危机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一个最为普遍的渴望便是对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的渴求。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年都曾生活在充满名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肖伯纳和斯特拉文斯基，毛泽东和甘地，丘吉尔和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时代里。这些名人中有很多都在 20 世纪的中叶故去；其他有一些则日薄西山，然而少数的几个人——如戴高乐、尼赫鲁，也许还有肯尼迪和金日成——也进入了领袖的万神殿。这些名人跨越了我们的文化、智力和政治视野。我们——遍及各地的追随者们——或爱戴他们，或憎恶他们；或追随他们，或反对他们；或为他们而死，或将他们中的一些人杀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中，我们与领导的生死与共已经让位于对个性的崇拜，让位于以令人惊叹 (gee whiz) 的方式对待各路名人。我们窥视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就好像他们的睡眠习惯、饮食习惯、性生活、爱犬和个人嗜好都传达出具有深刻意义的信息。所有的杂志都热衷于刊登有关“人们”鸡毛蒜皮的琐事，严肃报纸的新闻报道也总是先讲述某个名人的轶事或倾向，然后才进入事情的正题。在红场和天安门广场上，如潮的人流高举着并非巨人的人的巨幅画像游行。个人崇拜——既崇拜英雄，也崇拜魔鬼——在东方和西方都是盛极一时。

目前，领导危机在于，如此多的当权男女平庸无能和不负责任，而又很少有领导脱颖而出以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潜伏在平庸背后的根本危机是理智的危机。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领导者了解得太多，那么我们对于领导就可谓知之甚少。我们没能把握与现今时代密切联系的领导的本质，所以我们就不能对那些用来衡量、吸收和拒绝它的诸多标准达成共识。难道领导仅仅就是文化或政治的创新吗？难道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鼓舞，就是动员追随者？就是如何设定目标，如何实现目标？一个领导者就是价值观念的定义者，就是需要的满足者吗？如果领导们需要追随者，那么是谁领导谁？从哪里走向哪里？为什么是这样？领导者们是如何领导追随者而又丝毫没有被迫追随者所领导？由此可见，领导是世界上为人关注最多而又被理解最少的一种现象。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至少两千年的时间里，思想的领导者们，就针对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之间的棘手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早在现代的社会学出现之前，柏拉图就不仅分析了哲学王（philosopher-kings），而且分析了他们的成长经历、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追随者的回应对统治者的影响。早在今天呼唤道德领导和撰写《勇敢人物的画像》^①之前，儒家的思想者们就能通过他们的道德说教和实例来考察领导的概念。早在甘地之前，基督教的思想者们就在鼓吹非暴力。而在远远早于现代传记出现的时候，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就以生花之笔描述了罗马及希腊统治者和雄辩家们的生活，并争论说哲学家们“特别应当与‘当权者’交往”，并且探讨“老人是否也应该致力于公共事务”这样的问题。莎士比亚在他的著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中就借用了这位传记作家的观点。

有关统治者的大量文学著作在古典文学时期及中世纪曾繁花似锦。其后——由于一些值得我们深究的原因——关于统治和领导的研究陷入了严重的智力困境中。作为一种概念，领导被分解为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含义。一项最近的研究找到了领导的130种定义。有关领导者们的严重过剩的事实资料远远超过了对于领导的理论研究。世界闻名的纽约公立图书馆藏有好几万种有关不同政治领导者的传记、专论和报纸剪辑，但只有一个目录条目是“政治领导”（涉及的是四十年前一位不为人知的政客）。

简言之，不管是知识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没有关于领导的专门领域。我们缺乏评估过去、现在和潜在的领导者的标准，这要紧吗？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的哲学传统，没有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累积，没有指导理念，没有被尊重的实践经验，我们就缺乏一种基础来了解这种与我们的生活相联系并且塑造我们生活的现象——即在艺术、学术、科学、政治、专业和战争中的领导。没有这种标准和知识，我们很难清晰地区分不同类型的领导，我们也不能将领导者与统治者、掌权者以及专制者区分开来。希特勒自称——同时也被别人称作——元首，他那奇异的“元首论”（*führerprinzip*）被作为领导的教义受到了郑重的研究。但是一旦他掌握政权并且镇压所有的反对者时，希特勒便不再是领导者，他成了一个暴君。领导者和暴君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

尽管我们没有关于领导的专门领域，但我们却有发展这样一个领域应具备的众多的、多样的素材。极其庞大的数据、分析和理论库业已发展形成。然而，有关领导的核心概念却尚未形成，部分的原因在于学者们工作于不同的学科和分支，从事对不同且通常互不相关的问题和难题的研究。然而，我相信，由于有了丰富的研究、分析和思考经验，特别是过去近十年的积累，我们目前有能力取得知识上的突破。在人本主义心理学方面的极为重要但大多前所未闻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现在可以跨越文化和时间来概括领导过程。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所在。

在领导研究方面的一个最为严重的失误，便是关于领导的文献与关于追随者的文献之间存在的分歧。前者涉及历史上的英雄或具有神奇力量的人物，通常借助于传记的形式，并且有一个未言明的重要前提，即声望与显赫地位对等。后者涉及的是听众、大

^① 指约翰·肯尼迪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所撰写的《勇敢人物的画像》（*Profiles in Courage*）一书，记述了在面对巨大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时表现出道德勇气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的8位美国参议员。此书于1956年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被翻译为几十种文字，被大量杂志和报纸转载，并于1957年获得普利策奖。——译者注

众、选民、人民，通常借助于研究大众舆论和选举的媒介，而且它的前提就是深信：至少从长期来看，领导者是他们追随者的代言人。领导研究这一路径，通常会无意识地采取精英主义的观点；它将那些单调乏味、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作为凸显英雄人物的昏暗背景。而追随者研究这一路径，会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平民主义或反精英主义；它认为，即使是民主社会中的大众，也是与保守政客、军事官员、僧侣阶层及商人的重叠的小圈子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对领导的描述，既不是将它仅仅作为杰出人物之间的游戏，也不是将它仅仅作为平民论者的回应，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各个层次和各个缝隙中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结合在一起的作用结构。只有懒惰者、被排斥者和无能者不在其列。

现在应当将这两种文献合二为一，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在概念上统一起来，使领导研究超脱趣闻轶事和歌功颂德，被明确地置于人类发展和政治行动的结构与进程之中。我希望证明：领导的过程必须被看成是冲突发展过程和权力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领导若不与集体目的相联系则一无是处；领导者的效力不是由对他们的新闻报道数量来判定，而是由实际的社会变革来判定，而这种变革又是由意图及对人们需要和期望的满足程度来衡量的；政治领导依赖于一个长长的链条，即依赖于生理的和社会的一系列过程，与政治机遇和封堵（closures）结构的一系列互动，以及在对道德原则的要求与对必要权力的认可之间的一系列相互作用；在将政治领导的这些概念置于历史因果理论的中心的进程中，我们将重申，在处理人类事务时，存在着人们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并且存在着形成关于正义的共同判断标准的可能性。

我所研究的领导，明确区别于单纯地掌权，它是与残暴的权力相对立的。我将确定两种基本的领导类型：**交易型**和**变革型**。大多数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是**交易型**的——领导接近追随者是着眼于以物易物：以工作换选票，或以补助换竞选捐助。诸如此类的交易则构成了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关系的主流，特别是在各种群体、立法机构和政党中。**变革型**领导，虽然更复杂，却更为有效。变革型领导者确认并利用潜在的追随者现有的需要或要求。但不仅如此，变革型领导者还能够发掘追随者潜在的动机，试图去满足其更高的需要，并且使追随者成为全身心地为己效劳的人。变革型领导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相互激励和提高的联系，这种联系会使追随者转化为领导者，也可能使领导者成为道德的代言人。

最后的这个概念，即**道德领导**（moral leadership），最为我所关注。我用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是：第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不仅存在权力上的关系，而且存在共同的需要、渴望和价值观念的关系；第二，追随者在回应领导者的过程中，充分了解了可选择的领导者和纲领，从而具有了在这些领导者和纲领中进行选择的能力；第三，领导者有责任来兑现他们的承诺——如果他们许诺进行某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话，他们就要在推进这一变革的过程中承担起领导责任。道德领导并不是单纯的说教，或信誓旦旦地表明虔诚，或是主张社会的顺从。道德领导来自于并总是回归于追随者的基本欲求、需要、渴望和价值观念。我所说的这种道德领导，是能够产生那种将满足追随者的真正需要的社会变革的领导。我更多的是指“金律”（Golden Rule）^①，而不是“十诫”

^① 指《圣经》上所讲的为人准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译者注

(Ten Commandments)。但即使是金律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只是简单地用我们自己的愿望和需要去判断其他人的愿望和需要。

简言之，我建议从通常的“实际”问题转向最为严格的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假定领导者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做成的”，我们将在人的起源和社会化过程中寻找能够解释领导的理论模式。应用那些强调动机、价值观念和目标的发展结构的概念，我们将辨认出领导与众不同的角色和品质。我们将注意到领导与追随的相互交织的结构，注意到在社会的大多数层次中第二、第三甚至更低层领导所形成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圈，但还要承认其行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领导者”的作用。由于我们始终在探寻领导的道德基础，所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行为才是真正合法的：它们最终以某种方式有助于释放人类的潜能，而这些潜能现在被禁锢在各种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和被压抑的期望之中。

那么技巧和天赋对领导更加重要吗？我们能够将**领导者**与纯粹的掌权者区分开吗？我们能确认这样的一些力量，它们使领导者能够根据共同的、不受文化限制的需要和价值观念来采取行动，而这又反过来使领导者能够去展示真诚的道德领导吗？我们能够对付这些跨越政治形态并跨越时间的问题吗？我们能够因此将这些有关政治领导的理念应用于更为广泛的有关社会变革和历史因果关系的理论之中吗？

如果我们能够做成这些事情，我们就有希望去革新有关政治领导的一般理论了。同时，当我们从道德和因果问题回归到实际的领导问题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没有比有效的理论更实际的东西了，如果我们能够使理论革新的话。

目 录

第 1 部分 领导:权力和目的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一个最为普遍的渴望便是对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的渴求。

权力的持有者追求的可能不是权力，而是地位、声誉、威望和荣誉，或者是用权力来实现更崇高的目标。但他们也可能只是追求权力，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去使人们做他们想要做成的事。

第 1 章 领导的权力	3
● 乌干达国王的卡宾枪	4
● 普鲁士王子的保姆	5
权力的两个要素	6
领导与追随	11
领导不是什么：弥合理智的鸿沟	15
● 柏拉图关于船的寓言	15
第 2 章 道德领导的结构	20
权力与价值观念的源泉	22
● 塞凡湖的水位	22
●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与肯尼迪总统父亲的恩恩怨怨	23
冲突和意识	27
● 罗斯福争取第三次总统提名	30
领导的提升力量	31

第 2 部分 领导的起源

爱或归属感的需要，既有助于形成各种领导形式，也是形成不同类型的追随者的根源。

各种价值观念是领导者的弹药库：它既能唤起追随者的广泛支持，也能激起强烈的反对和冲突。

第3章 领导的心理根源	39
个性之茧.....	43
● 贵族出身的甘地和他的父母亲.....	44
● 少年列宁的家庭：幸福的乌里扬诺夫一家人.....	45
● 希特勒童年的阴影.....	46
● 俾斯麦的内疚感.....	49
● 少年舒马赫与他的母亲和姐姐们.....	50
● 埃莉诺·罗斯福的童年：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世.....	50
● 童年时代的尼克松.....	50
欲求的源泉.....	51
● 威尔逊总统和他的私人秘书.....	56
需要的变形.....	57
需要和价值的等级.....	60
● 民主是什么？.....	61
第4章 领导的社会根源	68
作为帝国的家庭.....	70
学校的政治教育.....	72
● 青年甘地遭遇父亲去世.....	76
● 希特勒悲若的青少年时代：父母先后去世.....	78
● 年轻的列宁先后失去父亲和哥哥.....	79
自尊、社会角色和共情.....	80
● 伍德罗·威尔逊的少年时代.....	85
第5章 政治领导的熔炉	89
雄心的激励.....	91
● 从英国到南非：青年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逐渐形成.....	91
● 青年希特勒的迅速崛起：从一战战败国伤兵到纳粹党党魁.....	93
● 青年列宁与列宁主义的形成.....	94
对需要的满足.....	96
● 权力与被认可的需求：孰轻孰重.....	96
●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淡定.....	99
开放与闭合：政治机遇的结构.....	102
● 对王子的教育.....	108
创造追随者.....	111

第 3 部分 变革型领导

经验，不管它如何明智，不过是他人对领导的一种回应，而最佳的理智领导却可以凭借想象和智慧的武器，预见、协调并最终征服经验。

第 6 章 理智领导：作为道德权力的观念	121
● 冲突造就的理智领导者	123
处于冲突焦点上的知识分子	124
● 沙龙中的知识分子与女士们	126
● 托在维尔眼中的知识分子	128
自由与权力	128
● 霍布斯与洛克的共同点	130
● 欧洲的咖啡馆和俱乐部	131
知识分子与自由的本质	136
变革型权力的理智考验	140
第 7 章 改革领导	145
● 英国首相格雷的早年生活	147
英国：坚定的单一主义者	148
俄国：自上而下的改革	156
● 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解放农奴改革的失败	156
美国的改革：进退维谷的变革型领导	163
第 8 章 革命领导	172
● 马丁·路德的革命	174
法国：领导的大漩涡	177
● 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爆发	177
俄国：领导的天职	185
● 列宁的《怎么办？》：一本关于革命领导的小册子	187
● 俄国 1905 年革命	189
●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中	192
中国：对领导的崇拜	196
● 毛泽东的早年生活	200
第 9 章 英雄和思想倡导者	207
● 弗洛伊德与摩西	208
● 时代造就的女英雄：圣女贞德	209

英雄式领导	210
● 苏丹马赫迪起义	211
● 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肯尼迪?	214
意识形态式的领导	215
作为变革的领导	218

第 4 部分 交易型领导

交易型领导必定会导向种种短命的关系，因为买主和卖主不会重复同一交换，他们都必定要转向新的满足类型和水平。最为重要的是，交易型的满足本身可能是一种限于表面的和无足轻重的满足。

第 10 章 舆论领导：拼图遗失的一片	223
唤醒：政治舆论的动员	225
● 三种类型的领导者	227
● 三种类型的公众	229
汇集：舆论的联盟	230
投票：舆论的转换	237
● 竞选过程中政党领导者如何回应重大问题?	239
● 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政党重组	241
第 11 章 群体领导：议价者与官僚	248
● 街头青年小群体的领导	249
小群体的领导	250
● 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凝聚力	252
官僚机构与领导	255
● 何谓官僚机构?	255
在政治利益集团中的领导	260
第 12 章 政党领导	265
各种政党：冲突与领导	268
政党领导者和政府领导者	271
● 麦克唐纳与英国工党的崛起	272
● 法国激进党的致命缺点	277
● 澳大利亚工党的纪律	279
● 美国政党中总统和党魁谁说了算?	280
一党领导	282
政党领导：权力与变化	289